

谁是幸福的?

——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何立华 金江*

摘要: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 个体特征 外部环境 收入

一、引言

追求幸福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正如英国哲学家休谟所言,“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正因如此,幸福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关注和重视。早在2003年,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理念。这一发展理念的提出,意味着政府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即所谓的软指标——幸福指数。在中共中央的启发和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也逐渐将幸福视为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甚至提出了明确的施政目标,如武汉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人民幸福城市,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发展目标。

如果说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幸福的话,那么我们的幸福水平是怎样的呢?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其中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04-2006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幸福感分别为3.79、3.72、3.64,呈下降趋势。这一现象似乎令人费解。毕竟,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中国人均GDP以年均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这两个特征事实可能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经济增长和收入提高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意义吗?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这是本文分析和研究的核心问题。回答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因素对当前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具体影响,也能为下一步的改革方向提供明确的指导。

自从Easterlin(1974)的开创性研究以来,涌现了大量的关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 SWB)的经济学文献。就针对中国的研究而言,这些文献更多的是基于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决定因素和差异进行分析,如罗楚亮(2006)、Knight等(2008)和陆铭等(2009),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个体的主观特征(尤其是个性特征)、社会活动以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往往并不是其研究的重点。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因此,对主观幸福感的考量既涉及到个体本身的因素,同时也涉及到个体生活在其中的外部因素,即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基于此,我们认为,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相应的社会环境等是包含在幸福内涵中的不可忽视的核心因素。与已有的国内研究相比,我们围绕这些核心要素

* 何立华,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205,电子信箱:helihua007@163.com;金江,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邮政编码:519082,电子信箱:jiang7502@126.com。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和编辑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对现有文献的回顾和简要评论;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和变量选取;第四部分是计量分析,考察了不同因素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的影响;最后是简要的结论以及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相关研究的简要回顾和评述

在心理学和社会学中,幸福被看作主观福祉。当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人类幸福或不幸福的原因时,通常会涉及到性格(如乐观精神、自尊以及显示的自控能力)以及人口统计因素(如年龄、性别、婚姻以及教育)等因素。可以说,这些因素在其研究领域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积累了许多事实和理论方面的认知。一般的观点认为,乐观型、外向型性格和自尊心较强的人要更为幸福,如 Scheier 和 Carve 等(1985)、Diener 等(1992)等的研究均论证了这一结论。Scheier 和 Carver(1985)的研究发现,与那些悲观主义者相比,乐观主义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要更高。对这种研究结果的一个解释是,乐观的人更容易从过去和当前令人沮丧和不幸的生活状态中走出来,同时对未来生活将会变好的信念也更为强烈。相反,就那些悲观主义者而言,他们往往在很长时间内还沉浸在过去的幸福生活状态中且难以自拔,对未来生活变好的信念也不强烈,这就导致与乐观主义者相比,他们往往具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水平(Stutzer and Frey 2006)。

在主流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因为幸福被假定可以通过效用进行衡量,因此更高的收入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水平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效用随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由收入决定。因此,收入水平的高低被视作度量福利水平高低的一个主要指标,所有提高社会福利和减少贫困的经济政策,最后都会归结于经济的长期增长(罗楚亮 2006)。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 Easterlin(1974)的开创性贡献——“收入-幸福悖论”(Easterlin Paradox)的提出,幸福问题重新引起了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并使其基于不同的角度对与幸福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其中,就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研究而言,经济学家更加强调一些可观测的经济特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在经济学的视角中,性格和人口因素不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而更多关注的是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因素以及其他一些人口统计学因素和政治层面的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①

就收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来看,虽然不同学者研究目的不尽相同,但其关注的焦点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问题:一是在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特定时期,人们的收入越高越幸福吗?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的增加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水平吗?三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吗?从现有的各类文献的研究结果看,如下三个结论已经在不同学者的研究过程中得到论证并已形成共识:一是当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收入的增加对主观幸福感有正的影响,但是,当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长并超过某一水平时,主观幸福感水平将保持不变;二是在一个特定国家的某一时期,富人比穷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三是就不同国家的情况而言特别是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人均收入更高的国家,其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也更高。但是,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水平产生的正效应,在人均收入更低的国家表现得更显著(Graham 2005)。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仍是经验性的。虽然上述文献很少涉及中国的情形,但是这些研究既是估计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基础,也是检验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基准。具体到对中国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罗楚亮(2006)以及陆铭等(2009)从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制度出发,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等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探讨导致不同群体的幸福差异的原因。而 Knight 等(2008)则专门针对中国农村居民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居民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样不幸福,即使是对那些处于贫困中的个体,由于他们的人生态度、期许对他们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他们也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这些研究中,个体特征(尤其是个性特征)、社会活动以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等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由于经济学领域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是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而展开,因此,在对幸福进行度量时往往

^①Oswald(1997)、Frey 和 Stutzer(2002)以及 Dolan 等(2008)对经济学领域关于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综述。

基于主观途径,即通过设置一个调查问卷,在此基础上根据受访者对所列问题的答案的选择获取分析所需的数据。从主观幸福感调查问卷的问题设置来看,问题的提出通常包括两种做法,即单问题调查方法(Single-item Approaches,如 World Value Survey)和多问题调查方法(Multiple-item Approaches,如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其区别在于,前者是在调查问卷中通过设置一个单独的问题,要求受访者根据这一问题提供的答案进行选择,而后者则是通过主观幸福感具有的多维度内涵,分别设置不同类型的问题对受访者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进行考察。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 Inglehart 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 WVS),WVS 第四次调查数据库中的中国大陆数据样本。^①为了测度主观幸福感,WVS 向受访者提出的问题是:在考虑所有因素的基础上,您如何评价自己近来的生活?^②该问题的可选答案是给定的十个分数,包括从1(不满意)到10(满意)十个等级标度。在第四次调查中,关于中国的有效样本为991个,主观幸福感水平平均值为6.530,标准差为2.468。表1列示了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对应的人数及所占比例。

表1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分布

主观幸福感	频数	频率	累积频率	SWB	频数	频率	累积频率
1	34	3.43	3.43	6	141	14.23	46.62
2	49	4.94	8.38	7	131	13.22	59.84
3	59	5.95	14.33	8	174	17.56	77.40
4	45	4.54	18.87	9	83	8.38	85.77
5	134	13.52	32.39	10	141	14.23	100.00

(二) 变量选取及其描述

从一般的社会现实看,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可以分为两大类:(1)个体的主观特征,如教育程度、收入因素、过往的经历以及对人生的态度等;(2)个体所处外部环境的特征,例如社会制度环境(如政府和司法系统是否可信,因为这为人们有序的生活提供了最终的保障)、社会结构(如收入不平等程度)以及社会信任水平等。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笔者将这些因素划分为四类,即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和社会环境。

在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个体特性因素中,经常被提及的几个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婚姻、信仰以及性格等。就年龄因素来讲,如果单纯对年龄与主观幸福感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可能并不能揭示两者之间的真实关系。基于此,参照 Easterlin(2006)以及 Ferrer-i-Carbonell 和 Gowdy(2007)的处理方式,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同时引入了年龄和年龄的平方项。同时,为了考察性别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我们还在模型中引入了性别虚拟变量。类似地,婚姻因素也经常被纳入到主观幸福感研究之中。按照常规的做法,在分析中我们使用了两个虚拟变量——已婚离异或分居来反映个体的婚姻状况。相应地,我们还考察了宗教信仰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产生的影响。此外,由于现有的研究表明乐观型、外向型性格的人一般更为幸福,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同样考察了性格因素的影响。借鉴 Uslander(2002)的做法,我们从人们对未来的不同态度上来把握其性格倾向,即用代表乐观(悲观)主义精神的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对科技进步的态度两个方面来进行把握。要说明的是,为了测度乐观(悲观)与否,WVS 调查了受访者对自身能否自由地选择和掌控生活的主观评价,其提供的可选答案是从1(完全不能)到10(非常能够)十个等级标度。为了避免分析过于繁琐,同时为了防止过多地损失样本中的有效信息,我们设定了 *optimistic* 和 *pessimistic* 两个虚拟变量(具体的定义参见表2)。

显然,人们的幸福程度与他们的具体状况是息息相关的。在我们的分析中,个人的具体状况因素包括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就业以及收入状况。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一个人的健康状况本是一个可以科学评价的客观因素,但是出于数据限制,我们选择用人们对其自身健康程度的主观评价作为一个替换变量来代替。

^①数据来源: World Value Survey 1981-2008 Official Aggregate v. 20090901, 2009. World Values Survey Association(www.worldvaluessurvey.org). Aggregate File Producer: ASEP/JDS, Madrid。另外要说明的是,迄今为止,WVS 总共进行了五次调查。除第一次外,WVS 都收集了中国的样本,时间分别是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由于第五次调查中的中国样本缺乏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些重要数据,因此,我们采用 WVS 第四次的调查数据。

^②英文原文为: All things considered, how satisfied are you with your life as a whole these days? (参见 Dolan et al. 2008)。同时注意到,尽管此处设置的问题是询问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水平,但是,根据已有文献来看,众多研究者并未对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进行区分,如 Buck 等(1994)、Blanchflower(1996)所采用的数据也是通过类似途径而获得。

另外,人往往被视为一种“群居动物”,因此,为了考察人际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活动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我们的分析包含了与之相关的四个因素,即朋友、参与文体和社区活动的多寡、是否是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以及是否是环保主义者或动物权利保护者等。

正如前文指出,在探讨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时不能脱离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生活中,人们不断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总是要依赖社会中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这种依赖,不仅仅体现在对他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依赖,还体现在对他人信守合作态度的依赖。基于这一事实,我们认为,作为一种广泛意义上和谐社会人际关系指标的普遍信任可能会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此外,由于收入的差异或相对收入水平是度量社会地位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因此,有必要把它纳入到分析之中。不过,由于缺乏合意的直接数据,退而求其次,我们用居民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的评价作为一个工具变量来代替。同时,由于居民的生活离不开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如社会保障体系、治安以及生活便利设施等,因此,政府能否有效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以满足居民的需求与主观幸福感水平之间应该存在一定的联系。不过,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数据难以收集,同时考虑到即使是同样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人具有的意义也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将居民对政府是否可信的评价作为一个工具变量纳入到分析之中。最后,考虑到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行动以及效率受到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因此,我们还在模型中引入了居民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这一变量。为了直观起见,表2列示了本文计量模型所包含的解释变量的具体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

表2 解释变量的定义及其描述性统计^①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变量均值	变量标准差
个体特征	<i>age</i>	受访者的年龄	40.278	11.496
	<i>age2</i>	受访者年龄的平方	1754.338	961.008
	<i>female</i>	受访者为女性 = 1, 为男性 = 0	0.506	0.500
	<i>married</i>	受访者已婚 = 1, 其他 = 0	0.875	0.331
	<i>divorced</i>	受访者离异、分居或丧偶 = 1, 其他 = 0	0.032	0.176
	<i>religion</i>	受访者信仰某种宗教 = 1, 其他 = 0	0.061	0.239
	<i>optimistic</i>	受访者对自由选择、掌控生活程度的评价大于 7 = 1, 其他 = 0	0.514	0.500
	<i>pessimistic</i>	受访者对自由选择、掌控生活程度的评价效益小于 4 = 1, 其他 = 0	0.123	0.329
	<i>science</i>	受访者同意从长期看科技进步有利于人类 = 1, 其他 = 0	0.796	0.402
	个体	<i>primary</i>	受访者接受的教育水平为初等及以下 = 1, 其他 = 0	0.418
<i>college</i>		受访者接受的教育水平为高等及以上 = 1, 其他 = 0	0.043	0.203
<i>health</i>		受访者对其身体健康程度的评价为一般以上 = 1, 其他 = 0	0.611	0.488
<i>unemployed</i>		受访者处于失业状况 = 1, 其他 = 0	0.048	0.213
<i>high - income</i>		受访者对收入水平的评价大于 7 = 1, 其他 = 0	0.154	0.361
<i>low - income</i>		受访者对收入水平的评价小于 4 = 1, 其他 = 0	0.245	0.430
社会活动	<i>friend</i>	受访者与朋友聚会的频率每月一次及以上 = 1, 其他 = 0	0.613	0.487
	<i>leisure</i>	受访者参加文体活动和社区活动频率每月一次及以上 = 1, 其他 = 0	0.047	0.213
	<i>helpelderly</i>	受访者是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服务的志愿者 = 1, 其他 = 0	0.560	0.497
	<i>environ_list</i>	受访者是环保主义者或动物权利保护者 = 1, 其他 = 0	0.277	0.448
社会环境	<i>trust</i>	受访者认为大部分人是值得信任 = 1, 其他 = 0	0.545	0.498
	<i>government</i>	受访者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为信任或非常信任 = 1, 为不信任或非常不信任 = 0	0.967	0.177
	<i>inequality</i>	受访者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大于 7 = 1, 其他 = 0	0.265	0.442
	<i>equality</i>	受访者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小于 4 = 1, 其他 = 0	0.469	0.499
	<i>democracy</i>	受访者对民主化进程感到满意或非常满意 = 1, 感到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 0	0.879	0.326

四、主观幸福感决定的理论模型及经验分析

从现有文献看,尽管学术界对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研究的视角不尽相同,侧重点也是千差万别,但他们所采用的理论模型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根据 Dolan(2008) 等的总结,分析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的模型一般

^①与测度生活态度一样,WVS对受访者评价其个人收入状况和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调查提供的可选答案也是从1到10的十个等级标度。因此,与选取测度生活态度的变量一样,我们分别对受访者的个人收入状况以及其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设定了两个虚拟变量。受访者对个人收入状况以及社会收入不平等的评价的取值范围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也做了类似的处理。

可以表述如下:

$$SWB = r(X)$$

其中, SWB 表示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它往往是通过采用单问题调查方法或基于多问题调查方式得到的, X 则表示一系列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因素。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 一般采取如下形式的计量模型:

$$SWB_i = \beta_0 + \beta_1 x_{1i} + \beta_2 x_{2i} + \dots + \mu_i$$

在对上述模型进行估计时, 一般可以采用 OLS 方法和 Ordered 方法。对于这两种方法在主观幸福感研究中的使用, Ferrer-i- Carbonell 和 Frijters (2004) 指出, 无论采用 OLS 方法还是采用 Orderd 方法, 在对主观幸福感和相关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时, 对模型最后的估计结果和系数的显著性并没有明显的影响。本文将选用 Ordered Probit 方法对上一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在具体的操作中, 我们首先检验了个体特性因素对 SWB 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 以层层递进的形式逐步考察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对 SWB 的影响, 以期对影响 SWB 的显著因素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运用统计软件 Stata10.0, 我们把估计所得到的结果列示在表 3 中。

表 3 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①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个体特性	<i>age</i>	- 0. 0629 *** (0. 0235)	0. 0642 ** (0. 0251)	- 0. 0631 ** (0. 0252)	- 0. 0700 ** (0. 0274)
	<i>age2</i>	0. 0008 *** (0. 0002)	0. 0008 *** (0. 0003)	0. 0008 *** (0. 0003)	0. 0008 *** (0. 0003)
	<i>female</i>	0. 0914 (0. 0702)	0. 0905 (0. 0769)	0. 0857 (0. 0776)	0. 0351 (0. 0860)
	<i>married</i>	0. 2722 * (0. 1449)	0. 2609 (0. 1615)	0. 2534 (0. 1552)	0. 2464 (0. 1722)
	<i>divorced</i>	- 0. 4483 * (0. 2489)	- 0. 3298 (0. 2652)	- 0. 3223 (0. 2660)	- 0. 3686 (0. 2985)
	<i>religion</i>	- 0. 0769 (0. 1449)	- 0. 1189 (0. 1545)	- 0. 1162 (0. 1552)	- 0. 1281 (0. 1781)
	<i>optimistic</i>	0. 6498 *** (0. 0772)	0. 6398 *** (0. 0817)	0. 6317 *** (0. 0819)	0. 6222 *** (0. 0905)
	<i>pessimistic</i>	- 0. 5451 *** (0. 1151)	- 0. 4991 *** (0. 1226)	- 0. 5038 *** (0. 1231)	- 0. 4295 *** (0. 1451)
	<i>science</i>	0. 0893 (0. 0870)	0. 0598 (0. 0948)	0. 0666 (0. 0953)	0. 1061 (0. 1045)
个体状况	<i>primary</i>		0. 0501 (0. 0819)	0. 0636 (0. 0831)	0. 0124 (0. 0920)
	<i>college</i>		0. 0182 (0. 1733)	0. 0332 (0. 1757)	0. 0351 (0. 1848)
	<i>health</i>		0. 3438 *** (0. 0776)	0. 3325 *** (0. 0779)	0. 3011 *** (0. 0861)
	<i>unemployed</i>		0. 3911 ** (0. 1925)	0. 4168 ** (0. 1939)	0. 2960 (0. 2156)
	<i>high - income</i>		0. 2162 ** (0. 0868)	0. 2421 *** (0. 0887)	0. 2485 *** (0. 0944)
	<i>low - income</i>		- 0. 2442 ** (0. 1074)	- 0. 2200 ** (0. 1081)	- 0. 3414 *** (0. 1265)

^①在模型 4 中, 变量 *unemployed* 的系数为正(不过, 并不显著), 因此我们怀疑该模型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使用 stata 中的 collin 命令, 诊断发现变量 *age* 和 *age2* 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 超过了 10, 变量 *married* 的方差膨胀因子为 2. 14, 而其他所有变量的 VIF 值都在 1. 0 ~ 2. 0 之间(由于文章篇幅的关系, 我们没有报告具体的诊断结果)。基于此, 我们比较了模型纳入或不纳入变量 *age* 和 *age2* 对其他变量系数方差的影响, 结果表明其影响非常微弱, 可以忽略不计。

续表 3

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社会活动	<i>friend</i>			0.0716 (0.0761)	0.0408 (0.0848)
	<i>leisure</i>			0.1180 (0.1720)	0.1632 (0.1832)
	<i>helpelderly</i>			0.1485* (0.0773)	0.1108 (0.0854)
	<i>environ_list</i>			0.0206 (0.0828)	0.0630 (0.0885)
社会环境	<i>trust</i>				0.0911 (0.0808)
	<i>government</i>				0.3119 (0.2331)
	<i>equality</i>				0.1709* (0.1020)
	<i>inequality</i>				-0.0931 (0.1119)
	<i>democracy</i>				0.2861** (0.2331)
	/cut1	-2.6595	-2.6595	-2.2606	-1.8644
	/cut2	-2.1543	-2.1544	-1.7291	-1.3193
	/cut3	-1.7961	-1.7965	-1.36271	-0.9089
	/cut4	-1.5926	-1.5926	-1.1410	-0.6867
	/cut5	-1.1075	-1.1075	-0.6450	-0.2322
	/cut6	-0.7012	-0.7012	-0.2473	0.1799
	/cut7	-0.3261	-0.3261	0.1404	0.5876
	/cut8	0.2346	0.2346	0.7171	1.1954
	/cut9	0.5993	0.5993	1.0848	1.5863
	观测值	896	820	816	687
	Pseudo R2	0.0427	0.0549	0.0564	0.0609
	Prob > 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括号里为系数的标准误。

从估计结果来看,可以发现:

第一,在个体特性因素中,受访者的年龄以及性格等因素对居民的 *SWB* 始终有显著的影响,而受访者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是否具有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具体而言,这些因素和 *SWB* 的关系是:(1) 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一种 U 型关系(根据表 3 模型 4,我们可以计算出年龄的拐点约为 39.6 岁)。我们的这一发现与 Appleton 和 Song(2008)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2 年针对中国城乡居民所做的家庭收入调查 CHIPS 数据得到的结果是一致的(其计算的年龄拐点为 40 岁)。(2) 就婚姻状况而言,变量 *married* 的系数为正,但其影响并不显著。我们的这一发现与罗楚亮(2006)一致,即婚姻对主观幸福并不存在显著的积极作用。虽然,婚姻能在死亡、发病率以及精神健康等方面表现出许多优点(Diener and Eunkook, 2000),因而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婚姻的存在往往同时意味着一种责任,有时甚至意味着某种经济或心理上的负担,如需要面临和解决子女的教育、抚养问题。至于婚姻生活的失败——分居或离异,对人们幸福水平具有负面的效应。不过,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把其他的非个体特性因素纳入到分析之中时,这种负向效应则是不显著的(见表 3 模型 2 - 模型 4)。一般而言,失败的婚姻生活总会给人带来挫折感而导致其幸福感下降。不过,失败婚姻的结束往往也意味着新的开始,因此对未来的生活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而这正、负两种效应可能导致了不完美的婚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3) 在体现性格因素的变量中,代表乐观(悲观)主义精神的对生活的态度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负向)效应。^① 原因是:一方面,乐观主义精神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感受;另一方面,由于预期到自己生活将有美好结果,相比于悲观者,乐观者往往会更努力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标。^② 而另一个变量 *science* 的影响则是不显著的,虽然其边际效应的符号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这种结果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因为,变量 *science* 反映的是“我们”总能解决自己的难题这样一种信念,它与乐观主义有紧密的联系;而变量 *optimistic*(*pessimistic*) 则反映的是“我”是否能够自由地选择和掌控自己的生活这样一种信念,是乐观(悲观)主义心理的直接体现。(4) 性别

^①根据变量 *optimistic* 的定义——受访者对其自由选择和掌控生活程度的评价,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与国内现有研究的结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如中国特有的城乡分割制度意味着部分人的 *optimistic* 取值比较低。

^②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譬如爬山,悲观者总觉得山太高,爬一步看一步,总觉得山顶还离得很远,累得气喘吁吁也没能爬到顶点;乐观者每爬一步,就觉得离山顶又近了一步,还不时欣赏一下两边的风景,最后轻松到达了顶峰。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

和信仰的影响不显著。就性别因素而言,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中国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从而抵消了女性由于性别差异产生的弱势特性。而信仰因素的影响可能与之相似。宗教信仰会让人们有更为宽容的心胸,能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困难,因此有宗教信仰的人可能会更幸福。不过,也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形——有的人之所以成为某一宗教的信徒,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宗教世界里找到心理的安慰和寄托,而原因则恰恰是因为其现实生活的不幸福。

第二,在个体状况因素中,收入与健康等因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始终有显著的影响。一般而言,良好的健康状况对主观幸福感会产生正的影响(Dolan et al. 2008),我们的研究同样也证实了这一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从某种程度上讲,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们是否幸福的一个基本前提,而我们的这一发现不过是对该观点的一种证实。与Easterlin(1974)发现的“收入-幸福悖论”不同,我们所得到的结果中,变量 *high-income*(*low-income*) 对主观幸福感始终有着显著的积极(消极)影响,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也随之增加。现有的研究表明,当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收入的增加对主观幸福感有正的影响,虽然当收入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增长并超过某一水平时,主观幸福感水平将保持不变(Graham 2005)。我们的发现可能印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虽然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表现出色。而在收入水平较低时,诸如自我完善或生命意义之类的非物质目标往往不是居民生活需求的主要内容。直白地说,现阶段中国居民生活需求的内容主要是物质方面的,因此在此时,“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变量 *primar* 和 *college* 的符号都是正的,即教育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一种“U”型的非显著性影响。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相对于接受高等教育或初级及以下教育的人,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因此更有可能感到不幸福。

第三,在社会活动因素中,无论是参加文体活动和社区活动或是与朋友交往,还是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志愿服务抑或是参加环保或保护动物权利等活动,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都不显著,虽然这些变量的系数都是正的。^①一般来说,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提供志愿服务、参加环保或保护动物权利等)不仅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的具体表现,它同时也意味着个人自我价值的一种展示、张扬和实现,因此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这种影响之所以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当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起步阶段,参与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对人们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有待开发的潜在需求而非真实的“消费”,因而不会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用。

第四,在社会环境因素中,我们的发现之一是,居民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而普遍信任水平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则是不显著的。一般来说,信任与社会交往和合作中的机会主义有关。现实中,对他人(包括组织)的信任如果最终为合作者的违约所背弃,人们会产生挫折感而导致不幸福。不过,反之则未必。因为,如果对他人的信任最终为合作者的履约所证实,由此产生的感受更多的应该是安心或释然而非幸福。Frey和Stutzer(2002)的研究表明,民主、权力分散、公众实际参与决策等制度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正向关系。原因有两点:其一,在直接民主的政治体制下,政治程序更倾向于以人们的偏好和意愿为基础,政治决策能更好地符合广大民众的意愿,政府活动也更讲求效率;其二,直接参与政治的权利具有程序效用(procedural utility),可以直接提高公民的快乐水平。显然,在一个转型社会中,民主、权力分散、公众实际参与决策等应该是其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当居民对民主化进程感到满意时,由于上述两种原因的存在,人们自然会感到更幸福。而另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在度量收入不平等因素的两个虚拟变量中,变量 *equality* 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面作用,而变量 *inequality* 的影响则是不显著的(虽然其系数符号与我们预期的一致)。对个体而言,收入不平等更多的是人们基于自身收入水平对社会收入状况的一种主观评价。因此,相对于高收入者,低收入者更有可能高估社会收入不平等水平。变量 *inequality* 的影响之所以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对于低收入者而言,“患寡”更甚于“患不均”。^②

在考察了哪些因素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之外,我们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这些因素中,哪些因素相对而言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在ordered probit模型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取最低值(最高值)的边际效应方向与系数符号相反(相同),而对于居中的被解释变量取值,系数的符号并不总是与特定的

^①模型3的结果表明,如果不考虑社会环境因素,变量 *helpelderly* 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

^②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2002年度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调查数据,Song和Appleton(2006)的研究表明,相对收入的差距显著地影响城镇居民的满意度,但其影响不及收入增长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发现可以视为Song和Appleton(2006)观点的一种印证。

变量取值下某个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的方向一致。因此,为了能够更为直观地说明解释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性,基于以上表3模型4的结果,我们计算出除年龄和年龄平方项之外的几个显著影响因素取值不同时的主观幸福感边际效应(结果见表4)。^①

表4 主观幸福决定因素的边际效应(基于表3模型4中的显著因素)

	主观幸福感水平									
	1	2	3	4	5	6	7	8	9	10
<i>optimistic</i>	-0.1657	-0.0645	-0.0137	0.0088	0.0472	0.0589	0.0534	0.0503	0.0149	0.0103
<i>pessimistic</i>	0.1590	0.0085	-0.0239	-0.0203	-0.0457	-0.0348	-0.0226	-0.0153	-0.0032	-0.0016
<i>health</i>	-0.0770	-0.0206	0.0016	0.0073	0.0239	0.0240	0.0189	0.0155	0.0040	0.0023
<i>high-income</i>	-0.0915	-0.0260	0.0007	0.0082	0.0283	0.0291	0.0234	0.0195	0.0051	0.0031
<i>low-income</i>	0.1245	0.0099	-0.0172	-0.0157	-0.0365	-0.0287	-0.0190	-0.0131	-0.0028	-0.0014
<i>equality</i>	-0.0875	-0.0244	0.0010	0.0080	0.0271	0.0277	0.0221	0.0183	0.0048	0.0029
<i>democracy</i>	-0.0544	-0.0131	0.00218	0.0055	0.0170	0.0164	0.0126	0.0100	0.0025	0.0014

注:基准是基于模型中的虚拟变量取值为0,其他解释变量取均值。

基于表4,我们的另外一个实证发现是:

第五,解释变量对不同SWB水平的边际效应是不同的,而且在不同SWB水平上,这些解释变量的边际作用排序也不是始终保持一致的。为了判定这些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我们考虑这样一种情形,即以调查数据中主观幸福感水平均值6.530为基准,把自主报告的幸福水平在此之上的居民视为幸福的,在此之下的居民视为不幸福的,则我们可以得到,除了年龄因素之外影响主观幸福感显著因素的边际作用从大到小排序是:*optimistic* > *health* > *democracy* > *pessimistic* > *high-income* > *low-income* > *equality*^②。另外,虽然性格因素的作用至关重要,但相对而言,我们更为关注经济以及其他社会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表4的结果,如果把自主报告的幸福水平在6.530以上的居民视为幸福的,那么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由中等收入者转变为低收入者,其是幸福的预计概率将下降3.63%,而中等收入者转变为高收入者的话,则其是幸福的预计概率将提高4.07%。类似地,随着变量*equality*和*democracy*由0变为1,幸福的预计概率将分别提高2.66%和4.81%。

五、结论和政策含义

幸福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要素。基于此,使用WVS提供的中国样本数据,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我们的主要发现是:(1)总体来看,与个体特性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以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2)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3)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首先,本文的结果表明,收入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积极的影响,即“金钱能够买到幸福”。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中国还有许多地区、许多农民连小康水平也没有达到。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追求人均GDP的增长仍然应该是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其次,在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以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等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而且后者的边际作用也高于收入因素。因此,对政府而言,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重视其他影响幸福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简而言之,在重视经济效率的同时,政府不仅要注重对社会公正、平等的提供和维护,同时还需在政治领域进行切实可行的民主制度改革,从而提高居民的幸福水平。

^①在Stata中可以用mfx命令来完成这一工作。

^②如果把自主报告的幸福水平在6及以上的居民视为幸福的,5及以下的居民视为不幸福的,那么显著因素的边际作用排序唯一的变化是变量*high-income*和*low-income*互换位置。具体而言,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形下,由中等收入者转变为低收入者,其是幸福的预计概率将下降6.50%,而中等收入者转变为高收入者的话,则其是幸福的预计概率将提高6.47%。

参考文献:

1. 陆铭、蒋仕卿、佐藤宏 2009 《城市“二元社会”里的悲喜——户籍身份、收入差距和参照对象差异》,第四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学术会议论文。
2. 罗楚亮 2006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经济学(季刊)》第3期。
3. Appleton S. and L. Song. 2008. “Life Satisfaction in Urban China: Components and Determinants.” *World Development*, 36(11): 2325 – 2340.
4. Bjornskov C. 2003. “The Happy Few: Cross – Country Evidence on Social Capital and Life Satisfaction.” *KYKLOS*, 56(1): 3 – 16.
5. Cheung, C. K., and K. K. Leung. 2004. “Forming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5(1): 23 – 56.
6. Clark A. P., Frijters and M. Shields.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 95 – 144.
7. Diener E., E. Sandvik, W. Pavot, and F. Fujita. 1992. “Extraversion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 a U. S. National Probability Sampl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26(3): 205 – 215.
8. Diener E. and M. Eunkook. 2000.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9. Dolan P., T. Peasgood, and M. White. 2008.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 – be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9(1): 94 – 122.
10. Easterlin, Richard A. 1974.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witz*, ed. Paul A. David and Melvin W. Reder, 89 – 125. NY: Academic Press.
11. Easterlin, Richard A. 2006. “Life Cycle Happiness and Its Sources: Intersections of Psychology, Economics and Demography.”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7(4): 463 – 482.
12. Ferrer – i – Carbonell, A., and P. Frijters. 2004. “How Important Is Methodology for the Estimate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Happiness.” *Economic Journal*, 114(497): 641 – 659.
13. Ferrer – i – Carbonell, A., and J. M. Gowdy. 2007.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Happiness.” *Ecological Economics*, 60(3): 509 – 516.
14. Frey B. S. and A. Stutzer. 2000. “Happiness, Economy and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Journal*, 110(466): 918 – 938.
15. Frey B. S. and A. Stutzer. 2002. *Happiness and Econom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6. Graham C. 2005. “The Economics of Happiness.” *World Economics Journal*, 6(3): 41 – 55.
17. Knight J., L. Song, and R. Gunatilaka. 2008. “Subjective Well – be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4): 635 – 649.
18. Oswald A. J. 1997. “Happines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conomic Journal*, 107(445): 1815 – 1831.
19. Scheier, M., and C. S. Carver. 1985. “Optimism, Coping, and Health: Assessment and Implications of Generalized Outcome Expectancies.” *Health Psychology*, 4(3): 219 – 247.
20. Song Lina and Simon Appleton. 2006. “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into Social Discontent in Urban China.”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Research Paper. Available at http://www.nottinghamenterprise.com/shared/shared_levpublishations/Research_Papers/2006/06_45.pdf.
21. Stutzer, Alois, and Bruno S. Frey, 2006. “What Happiness Research Can Tell Us about Self – Control Problems And Utility Misprediction.” IZA Discussion Paper 1952. Available at <http://repec.iza.org/RePEc/Discussionpaper/dp1952.pdf>.
22. Uslaner E. M. 2002.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Trust*.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ho Is Happy?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SWB

He Lihua¹ and Jin Jiang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Abstract: Subjective Well – Being (SWB) is individual subjective feeling and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re key factors included in the concept of SWB. Based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surveys the determinants of SWB in China. The conclusions indicate that: (1)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ge, character, income and health a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SWB. Meanwhile, the level of democratiz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SWB. (2) If we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age factor, of all the factors which are correlated with SWB, the role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factors is higher than other factors. (3) The marginal role of income factor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ncome inequality factor, but their marginal effect is minimal.

Key Words: Subjective Well – Being;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External Environment; Income

JEL Classification: I39

(责任编辑: 孙永平、陈永清)